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0.02.005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

牟方磊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论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迄今,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论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强调文学从属政治, 到坚持文学疏离政治, 直至主张文学与政治互渗的演变过程。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三: 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转型; 文学接受和创作实践的变化; 文论资源和研究范式的更新。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的经验体现为: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发展应呼应社会结构的转型, 吸取多元化的理论资源, 契合文学创作与接受实践。在中国当代文论史上, 关于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偏狭之见主要表现为二: 将文学从属于政治; 将文学与政治截然两分。破除政治与文学二元对立思维, 刷新对“政治”概念的理解, 可克服上述偏见。

关键词: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 文学; 政治; 社会结构; 文学创作; 二元对立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0)02-0033-08

引用格式: 牟方磊.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5(2): 33-40.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U Fangl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emphasizing the subordination of literature to insisting that literature alienates politics, and then to advocating the mutual infilt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or this chan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social structure, the change of literary acceptance and creation practice, and the renewal of literary theory resources and research paradigm. The experienc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echo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absorb diversified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conform to literary creation and acceptance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the narrow-minded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收稿日期: 2020-03-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18ZDA278)

作者简介: 牟方磊(1984—), 男, 辽宁喀左人, 湖南师范大学讲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subordinating literature to politics and separating literature from politics. The above-mentioned prejudice can be overcome by breaking away from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and refresh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s".

Keywords: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terature; politics; social structure; literary creation; binary opposition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在中国本土产生,吸收了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全部精华,符合中国文学现实和中国人精神内核与审美习惯的文学理论。”^[1]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论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一个老话题,儒家文论强调文学的政教作用,标举“文以载道”,是这一话题在古代中国的呈现;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这一话题在近代中国的呈现;左翼理论家强调文学的阶级属性,是这一话题在现代中国的呈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此话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其重要性得到极大凸显。虽然不同学段的学者都围绕着“文学与政治关系”论域致思,但因为社会文化语境的差异以及其他原因,此一话题往往会以不同的面相、方式与内涵反复凸现出来,引起人们的重新思索。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之嬗变,探讨造成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文论界继续深入思考这一重要话题,不无裨益。

一 中国特色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的嬗变过程

新中国成立迄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论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强调文学从属政治,到坚持文学疏离政治,直至主张文学与政治互渗的演变过程。

(一) 强调文学从属政治

强调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是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必须服从党的革命任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文论界坚持的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来自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对当时文论的影响具有笼罩性与绝对权威性,其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体现为著名的“三论”:其一,从

属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2]13}其二,工具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2]2}“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2]13}其三,服务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必须“服从党在一定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2]17}。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不管是重要会议的文献,还是宣传文化部门领导的讲话,抑或通行的文艺学教科书,以及各报刊的社论与文章,甚至当时被划为“右派”并遭受批判的文论体系,都在反复地申明并强调这些原则。比如茅盾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强调“文艺要为生产和中心工作服务”^[3];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指出“革命的文艺从属于革命的政治”^[4];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以一节篇幅论述“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强调“文学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5];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也明确表示文学事业是人民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应当为政治服务和为劳动人民服务。

实际上,《讲话》虽然强调文学从属于政治,但并未忽视艺术形式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性,政治上的进步固然是根本性的,但艺术上的成功亦不可或缺。《讲话》明确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2]15-16}。但事实上,

随着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两条战线”逐渐演变为“一条战线”，“一条战线”又走向极端，最终跌进十年浩劫的深渊。

整体看，“文革”前十七年中，“文学与政治之间是一种‘父子’关系，其基本特点是，‘三论’占据主导地位，文艺的相对独立性，文艺创作的规律和特征日益受到轻视和排斥，因而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走向歧途。”^{[6]10}

（二）坚持文学疏离政治

客观地说，片面强调文学对于政治的从属性、服务性和工具性，容易使文学失去自身的特点，沦为政治宣传的“传声筒”，这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文学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新时期伊始，随着政治社会思想形势的日渐好转，人们再次将思想聚焦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意图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重新反思此一话题，在理论上为文学的健康发展开辟新路。“从理论批评层面看，在思想解放的滚滚浪潮中，文学理论界首先反思的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7]103}

从1979年上半年开始，国内文论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争论，争论焦点是文学与政治到底是何种关系？“三论”能够科学概括二者的关系吗？当时形成了两派观点：赞成“三论”与反对“三论”。（关于此次论争的详细情况，可参看汤学智《新时期文艺学热门话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整体来看，反对“三论”一方顺势而为，并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有力支持，处于攻势，占据主流；赞成“三论”一方短时间内还难以克服长久养成的思想定式，逆势而动，与主流意识相悖，处于守势，占据末流。这场争论为文学争得了应有地位，起到了为文学“松绑”的作用，文学与政治的依附关系因此发生变化，文学的独立品格开始得到强调，1980年代的文艺解放思潮就此开启。

在理论层面上可以说，1980年代是文论界重新确认文学自主性的时代。这种“确认”主要表现在“主体”“方法”“审美”“学科”等方面。

其一，“文学主体性”的提出。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集中阐发文学的主体性原则，力图恢复文学的主体地位，并提出文学三主体说：创造主体、对象主体和接受主体。陆贵山的《审美主客体》和畅广元主编《主体论文艺学》，也

从不同的角度，借助不同的理论资源，建构起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大厦。文学主体性的提出“标志着文学研究的历史超越和从客体向主体、从‘外’向‘内’的转折”^[8]，这是从主体层面确认文学的自主性。

其二，关于“文艺学方法论”的引进与争论。打破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一统天下局面，引进更切合文艺自身特点的多元方法，成为新时期文艺学方法论变革的核心诉求。1980年代文论界引进了大量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新方法备受欢迎，旧方法颇遭冷落。一些坚持马列方法“一元论”的资深学者如陈涌、陆梅林等撰文批评以刘再复为首的“多元论者”，而林兴宅、朱立元等则支持刘再复，这场争论的整体走势是从各执一端走向辩证统一。文艺学方法的大量引进，是文学研究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这是从方法层面确认文学的自主性。

其三，“审美诗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等文论新体系的提出。这些新体系高扬文学的审美属性，努力凸显“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这是从审美层面确认文学的自主性。

其四，诸多文艺学新学科的建立。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新学科创建的勃发期，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学人类学、文学符号学、文学批评学、文学叙事学、文学文体学、文学创作学、文艺社会学、文学价值学、文学文本学、文学言语学、文学修辞学、文学解释学、比较诗学等等，如雨后春笋，这是从学科层面确认文学的自主性。

整体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与政治不再是“父子”关系，而是更像“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邻里”关系，文学终于摆脱政治的束缚与压抑，获得相对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文学创作的规律和特征日益受到重视，开始了轻装上阵、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三）主张文学政治互渗

片面强调文学对于政治的从属性，固然不足取，但将文学与政治一刀划开，坚持文学疏离于政治，也有其自身的理论困境，它无法说明文学与政治紧密相关的实际情形。文学作为用语言反映社会生活、表现社会人的思想感情的艺术，不可能脱离政治，所以不应该问“文学与政治有无关系”，而应该问“文学与政治有何关系”。

20世纪末,文学理论研究者开始重新思索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重返历史、重返意识形态的转向。这种重新政治化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外学人对文学批评现状的反思。人们逐渐意识到,任何疏离政治和游戏政治的做法,只不过是掩耳盗铃,最终伤害的是人自身和赖以生活的社会环境。”^[96]比如有学者在科学的层面上重新思考文艺与政治相互关系问题,分别从政治的审美三维(政治活动的审美性质、文艺创作对政治的艺术掌握、政治意识对文艺创作的介入)和文艺的政治三维(文艺功能中的政治效应、政治对文艺接受和文艺生产的影响、政治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和管理)全面、系统、深入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政治学的理论内涵,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政治学构想^[90]。

新世纪以来,很多学者在更加广阔的理论视域中重新观照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如张永清从政治文化与文化领导权等理论视角来认识与把握改革开放30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针对文学与政治关系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三大应对策略:克服在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两种错误认识即等同论与对立论;在倡导主旋律、提倡政治文化建设的同时,也要为审美文化、商业文化等的建设拓展足够的发展空间;对“文学的非政治化”“反对文学的非政治化”等主张应作具体分析^{[7]106-107}。陶东风重申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知识的政治维度——当然不是极“左”时期“为政治服务”意义上的政治,而是作为公共领域自由行动意义上的政治^{[11]6}。胡亚敏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文坛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化(过度政治化)、去政治化到重新政治化的过程。在新历史语境下,政治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改变,即从阶级政治延伸到人民政治,从宏观政治走向微观政治,从显性政治转化为隐形政治。这种重返和转型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予以重新审视和表述^{[9]5}。

整体看,20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在学者们看来,我们不应将文学与政治看作是“父子”关系,也不应该看作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邻里”关系,而是应该看作处于平等地位、密切相关的“夫妻”关系,文学与政治都具有各自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在“交叉关系”中实现和谐共处。

二 中国特色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的嬗变原因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中国当代文论的“关键性问题”,在不同时段和不同理论家那里具有不同的提问方式与答案,任何一个关键性文论问题的流变必有其原因,可从理论与社会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自身的发展等角度思索。

(一) 从理论与社会关系角度看,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转型造成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的嬗变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转型也必然会带动包括文论观念在内的社会意识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百废待举,当时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仍是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从根本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彼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典型的以政治为主导,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等都以政治为中心,呈现出“众星拱月式”的结构特征。在此社会语境与社会结构下,作为文化之一类的文学与文论,必然也要从属并服务于政治大局。回到历史现场,就可比较切实地感受到《讲话》“三论”的现实合理性,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曾以牙齿为例来谈文学的社会作用。他说牙齿一般情况下是用来吃东西的,但在打架这样的特殊情境下,它也可以作为武器用来咬人。同理,文学本是具有独立性的艺术品种,其基本作用在于怡情悦性,但在战争时期或新中国成立之初等某些特殊时期,它也可以作为革命的武器工具,从属并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的社会语境和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此时的主要政治任务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思想文化观念的重建,彼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呈现出政治-文化“二元对位式”的结构特征。为了能够使这一主要政治任务顺利实施推进,官方意识形态急需破除极左思想的禁锢,挣脱“神话的蛛网”,树立簇新的理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吁求自上而下响彻于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就是在文论界掀起的一场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正如上文所言,这场争论为文学争得了应有地位,

起到了为文学“松绑”的作用。此一时期，文学与政治的依附关系发生了变化，文学的独立品格开始得到强调，1980年代的文艺解放思想也就此开启。

20世纪80年代是市场经济的酝酿与起步期，市场尚未作为一个重要的结构元素作用并带动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全面展开，市场对于政治与文化的影响越益突显，市场开始作为一个重要元素参与到政治与文化的结构之中，彼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呈现出政治-市场-文化“三足鼎立式”的结构特征。市场因素的参与，将原本对称的结构变得复杂，文学在上个十年历尽艰辛争得的独立自主性，又被市场冲得七零八落，其从政治的奴仆一变而成为市场的婢女。政治看准这一趋势，顺势而为，不再赤裸裸直接插手文学事业，而是通过市场之手来间接掌握文学事业。当文论家们将批判的锋芒一齐对准市场，谴责其所造成的严肃文学的失落、大众文化的泛滥，谴责其所造成的文学的商品化、世俗化、庸俗化潮流时，却不经意间发现了市场背后的政治那强有力的推手。政治与市场的合谋再次将文学从中心排挤到边缘，这迫使文论家们再一次将思想聚焦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且逐渐意识到，“任何疏离政治和游戏政治的做法，只不过是掩耳盗铃，最终伤害的是人自身和赖以生活的社会环境。”^{[9]6}

（二）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角度看，文学接受和创作实践的变化造成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的嬗变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反作用于实践。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中国对西方世界采取文化封闭政策，将开放的窗口主要朝向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老大哥。苏联文学尤其是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对当时的中国文学和文论影响甚巨。除此之外，当时国人接受较多的是少数具有人民性的政治倾向比较进步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国现代左翼文学作品，以及当时官方认可的主流作家所写的作品。另一方面，当时作家能够自由发挥的空间特别狭窄，所写作品多为艺术粗糙、缺乏深度的服务性的“号筒”之作。在这样的文学接受和创作实践语境中，理论家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呈现出简单化、单极化倾向，就不

难理解。最起码可以说，当时的文学接受和创作没能为文论家深入思索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提供强有力的实践支撑。

进入新时期，国门重开，西方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如潮水般涌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进入，给人们文学观念以极大冲击。从1980年到1984年，中国文论界开展了一场关于“现代主义”的激烈论争。另一方面，从1980年代起，我国一批带有现代主义创作倾向的青年诗人开始登上舞台，形成了一股被称作“朦胧诗”的新诗潮。“朦胧诗”之后又有“先锋小说”“先锋戏剧”等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相继出现。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角度着眼，现代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有意疏离于政治，后者刻意从属于政治。可以说1980年代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接受和创作，为当时文论家重新思索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支撑。

从1980年代初起，通俗文学在改革春风吹拂下悄然复兴；1985年之后，通俗文学创作持续高涨，通俗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从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开展，大众文学开始慢慢占据消费主流，严肃文学退居边缘。通俗与大众文学以其内容的通俗性和形式的流行性，深受民众喜爱，其对民众的衣食住行、思想观念也产生了重要的形塑作用，也因为如此，它们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大有可为之地。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场的潜移默化影响，在通俗大众文学领域，远较严肃文学领域为甚。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角度着眼，通俗大众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无意地从属于政治，后者有意地疏离于政治。可以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大众文学接受和创作的繁荣，为晚近文论家重新思索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支撑。

（三）从理论自身发展的角度看，文论资源和研究范式的更新造成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的嬗变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文论界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所借助的文论资源主要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其主要构成部分有三：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论观点；二是苏联领导人如列宁、斯大林的

文论观点;三是苏联官方文艺理论家如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季摩费耶夫、毕达可夫等的文论观点。正如有学者所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其中包括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62]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语境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政治领导文学,文学服务政治,其研究范式可称为“革命范式”^[12]。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这一时期,文论界着重借助马克思主义文论资源来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三论”成为“不可动摇的原则”,便容易理解了。

进入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西方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文论话语陆续涌入国门。出于对片面强调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文艺观念的反思,新时期文论界大力引介的是西方那些坚持文学审美性、自主性的美学与文艺学话语资源,如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贝尔的“艺术是意味的形式”,英美新批评的“文本中心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分”,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陌生化”,法国结构主义的“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二元对立”等等。这些理论话语都具有“审美乌托邦”或“语言乌托邦”倾向,其有意切断文学与作者、读者、世界的联系,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自主性,研究范式可称为“审美范式”。其对1980年代文论界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反思社会学等等反本质主义理论话语开始取代1980年代的形式主义文论话语,得到众多文论研究者的青睐。这些理论话语不再视文本为封闭自足的实体,而是着重发掘文本与社会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发掘文本背后潜隐的意识形态因素,其研究范式可称为“解构范式”。这为20世纪末以来文论界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重新重视文学的政治之维,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

三 对中国特色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论界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认识与反思,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与教

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有助于在新的社会现实中继续深入思考此一问题。

(一) 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的经验

1.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发展应呼应社会结构的转型

把准时代的脉搏,呼应社会的变化,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通过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之原因,可以发现,文论的生成、发展、更新离不开对社会结构转型的敏感与呼应。无论是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这一时期的“三论”,20世纪80年代的“疏离论”,还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互渗论”,它们的生成与嬗变都与彼时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三论”对应当时政治一元的“众星拱月式”社会结构,“疏离论”对应当时政治—文化“二元并置式”社会结构,“互渗论”对应当时政治—市场—文化“三足鼎立式”社会结构。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同样离不开对当前社会结构变化的敏感与呼应,正如有学者所言,只有从现实出发,激活旧话题,发展新话题,才是理论发展之路^[13]。如何加强理论“对象化现实”的能力,从社会生活的变化中激活旧话题,发展新话题,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研究者着力思考的问题。

2.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发展应吸取多元化的理论资源

任何理论建构都不是向壁虚构,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通过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之原因,可以发现,文论的生成、发展、更新离不开对多元化理论资源的汲取、消化与融会。没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汲取,则很难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三论”;没有对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等西方形式主义文论资源的汲取,“疏离论”的顺利生成也绝非易事;没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反思社会学等等反本质主义理论话语的积极参与,“互渗论”的提出也很难想象。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同样离不开对多元化理论资源的汲取、消化与融会,其理论资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实践经验的理论概

括升华这五个方面。如何从时空两个维度妥善处理这五大资源的关系，以实现五者的最优组合，将深刻影响着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内容、走向与特点。

3.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发展应契合文学创作与接受实践

文学理论之生成与发展，一方面固然得益于多元思想资源的优化组合，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与接受实践的激发也是重要的参与因素。通过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之原因，可以发现，文论的生成、发展、更新离不开对文学创作与接受实践的关注与回应。无论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的“三论”，20世纪80年代的“疏离论”，还是90年代末以来的“互渗论”，其生成与演化都与彼时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密不可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反作用于实践，理论与实践具有辩证关系，这本是基本常识，但实际情形并不尽如人意，文论脱离并无视文学实践而自说自话的情况仍旧普遍存在。尽管实际情形不尽人意，但重视文论建构的实践基础，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推动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创新，早已是学界共识。张江认为，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点，首要一点便是抛弃对外来理论的过分倚重，重归中国文学实践^[14]。尤西林认为当代文学理论困境根源于文学理论脱离文学经验的结构危机，根本出路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融合，以重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经验”这一基本结构^[15]⁶⁹。能否在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中推动理论创新，事关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发展的成败。

（二）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的教训与对策

在中国当代文论史上，关于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偏狭之见主要表现为二：一是简单地将文学从属于政治；二是简单地将文学与政治截然两分。张永清教授将其概括为“等同论”与“对立论”：“所谓的等同论，就是将文学简单等同于政治乃至某一阶段的政策，这一错误认识已被文学实践证明是极其有害的；所谓的对立论是等同论的翻版，即将文学与政治完全割裂开来，主张文学脱离政治，文学实践证明这种认识也是极为偏颇的，不利于文学的发展。”^[7]¹⁰⁶今天我们回顾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之嬗变，理应深刻认识到这两种偏狭之见的流弊，探讨形成这些

见解的深层原因，给出合理的解决办法。

1. 破除政治与文学二元对立思维

造成上述偏狭之见的主观原因之一在于研究者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不管是简单地将文学从属于政治，还是简单地将文学与政治截然两分，都是将文学与政治两级化、对立化，而没有认清二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对话关系以及其间中介因素的重要性。就文学对政治而言，文学对政治的表现既不是简单机械的反映，也不是刻意或被迫的迎合，而是以作者主体的审美心理和艺术手段为中介的反映。《讲话》所言的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只有通过作者主体的中介，才可能真正实现，才能够避免内容与形式的生拼硬凑。就此而言，1980年代以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为代表的“审美反映论”，对于我们重思文学如何表现政治题材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就政治对文学而言，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既不是直接的管理，也不是强硬的干涉，而是以“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为中介的“潜移默化”。普列汉诺夫充分注意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诸多中介因素的重要性：“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由这个程度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生成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些人的关系所表现的一种社会形式；与这种社会形式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与这种状况所产生的那些能力、趣味和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16]“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构成了政治与文艺之间的中介环节，政府的文艺管理部门只负责“坚守底线”与“陈诗观风”即可，因为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必然会通过“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这一中介发挥作用，政府对于文学，“宽容”则两利，“干涉”则两伤。另外，在新的现实语境下，还应充分意识到市场因素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所起到的中介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三元结构中各个元素之间相互制衡博弈的错综复杂性。

2. 刷新对“政治”概念的理解

造成上述偏狭之见的主观原因之二在于研究者对“政治”的狭隘理解。对于这点，有些学者已经意识到，比如陶东风教授在《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一文中说：“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么多文学研究的业界人士在极‘左’年代的不幸遭遇，以及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在那个时期的凋敝和荒芜，

对政治的这种排斥、抵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必须指出,这种广泛流行的‘共识’在学理上却是未经认真审理的。说它未经认真审理,是因为它对‘政治’这个术语、对文学理论和政治关系的理解是以特殊时期的特殊经验为基础的,并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国极‘左’时期中的‘政治’理解为普遍意义上的‘政治’,进而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的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普遍化为文艺和政治的常态关系,并且不顾语境的变化坚持这种理解。”^{[11]6}正是因为“政治”概念具有语境化特点,所以我们不应该将特殊语境中的“政治”概念普遍化、本质化,而应根据变化了的语境重新思考“政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陶东风教授看来,我们不应将对“政治”的理解固定在“极左时期‘为政治服务’意义上的政治”,而应该把现代的政治理解为“公共领域自由行动意义上的政治”,所谓“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中的“政治”指的就是后者。无独有偶,胡亚敏教授也撰文指出,“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政治的内涵和外延悄然发生着改变,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必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势对政治形态的走势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9]7}她认为现代政治的内涵与外延的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阶级政治到人民政治;其二,从宏观政治走向微观政治;其三,从显性政治转化为隐形政治^{[9]7-8}。这对我们重新理解现代政治的内涵与外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文学所关涉的“政治”更多地应是“微观政治”与“隐性政治”,现代西方批评理论中的各种政治如空间政治、性别政治、身体政治、身份政治、话语政治、审美政治、文化政治等也更多指的是“微观政治”与“隐性政治”。“微观政治”与“隐性政治”的日常性、渗透性、普遍性、隐蔽性,启示我们不能再将文学(文论)从属于政治,抑或简单地将文学(文论)与政治截然两分,

而应在新的思想视域中努力廓清二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对话关系。

参考文献:

- [1] 赵炎秋.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J]. 学术研究, 2019(5): 141.
- [2]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J]. 中国农业科学, 1966(8).
- [3] 茅盾. 创作问题漫谈[J]. 文艺报, 1959(5): 1.
- [4] 周扬. 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1960年7月22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戏剧报, 1960-08-13(1).
- [5] 蔡仪. 文学概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41.
- [6] 汤学智. 新时期文学热门话题[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 [7] 张永清. 政治·革命·文学: 对改革开放30年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反思[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6).
- [8] 高建平. 当代中国文论热点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70.
- [9] 胡亚敏.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文学与政治新探[J]. 文学评论, 2019(3).
- [10] 曾永成. 文艺政治学导论[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5.
- [11] 陶东风. 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J]. 文艺争鸣, 2008(1).
- [12] 余虹. 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J]. 文艺研究, 1996(3).
- [13] 高建平. 理论的理论品格与接地性[J]. 文艺争鸣, 2012(1).
- [14] 张江. 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析: 兼及中国文论重建[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5): 24.
- [15] 尤西林. 以文学批评为枢纽的文学理论建构[J]. 文艺理论研究, 2015, 35(3): 69.
- [16] 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第2卷[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1: 186-187.

责任编辑: 黄声波